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5

日本漢學

研究初探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張寶三、楊儒賓◎編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日本漢學

研究初探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張寶三、楊儒賓◎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張寶三、楊儒賓編

---初版---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2004〔民93〕 405面：15*21公分

ISBN 957-01-7253-3

1. 漢學 - 日本 - 論文, 講詞等

033.107

93007843

統一編號 1009301463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5

日本漢學研究初探

編者：張寶三、楊儒賓

策劃者：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行人：陳維昭

發行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地址：臺北市 106 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02-23630231 轉 3914

傳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2004 年 6 月初版

ISBN 957-01-7253-3

定價：新台幣 450 元

前言

楊儒賓、張寶三

一

漢學是有關中國文化的學問，但漢學卻是跨國際性的學科，任何現代優秀的中國研究學者，已很難閉門造車，他無法將自己局限在中文的圈子裡，然後幻想構造出偉大的體系。這種閉門自雄的想法顯然已經無法滿足當代學術的需求，因為時代的條件不一樣了。

我們能夠想像：研究中國思想與經濟關係的學者，他居然會跳過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及《儒教與道教》兩書嗎？研究唐宋文化史的學者，他能不考慮內藤湖南的宋代文化之假說嗎？研究中國小說戲曲的學者，他能夠不正視鹽谷溫、青木正兒等人的貢獻嗎？研究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學者，他能夠忽略史華茲、列文森的論點嗎？研究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政治關係的學者，他能不正視矢內原忠雄的批判性見解嗎？

如果要列的話，名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但答案顯然只有一種：不能。不能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學問已不能脫離跨國、跨學科的架構，孤立論述。不管論者喜不喜歡，我們都不能不正視一項事實：即中國打破隔離狀態，成為世界的中國以後，中國的學問也就不能再孤芳自賞，它必然會變成世界性的中國學問。同樣的一件史實，同樣的一件作品，同樣的一位思想家，它們在近代以前的意義絕不可能和在近代以後的地位一樣。我們試想：戲曲小說（如《三國》、《水滸》）、女性作品（如女書）、準科學著作（如《天工開物》、《本草綱目》）在今昔地

位的變化，即可了解箇中三昧。

不能的原因還可反向思考，我們固然同意中國的學問已不能脫離世界性的格局而立論，但任何普遍性的學問如果是普遍性的話，它恐怕也不能不考慮到中國學問的存在。張光直先生說：「中國的歷史也同西方一樣的驚心動魄，一樣的宏偉壯觀。但人們還沒有把它作為總結普遍規律的研究對象。」話說得很對，張先生的論點絕非出自文化民族主義，我們如果考慮到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所佔的比重之大，中國文明對人類所提供的精神遺產之豐富，我們即很難想像：完全撇開中國文化的因素不談，這樣建構出來的理論還能是普遍性的嗎？

也正因中國文化是構成人類經驗極重要的一環，所以如何適時而又深刻的理解中國的學問，此事遂不僅止於狹隘的中國學問之領域，它的意義深遠多了。而如何適時而又深刻的理解中國文化，此事又得回到問題的原點，此即我們身處今日，不得不具備跨學科與跨國別的學術眼光。

二

漢學無疑已是國際性的學問，但比較之下，以日、韓為主的東亞漢學研究尤其值得重視。美國的漢學研究史再怎麼寬鬆的計算，其時間都不出一兩百年；歐洲的漢學研究歷史當然長一點，但比較成氣候的了解中國思想與風土，其年代恐怕也要遲至明末耶穌會教士來華以後，歐洲與中國才算有了對話。日、韓的情況不同，如果我們對漢學採取廣義的定義的話，那麼，日、韓兩國的漢學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客觀性研究，因為漢學構成了兩國文化的重要內涵，日、韓是廣義的漢文化圈的成員，它們越了解漢文化，也就是越了解它們自己。甘迺迪歡迎希臘政治領袖時說：「我們都是希臘人」，如果大家不死抱政

治字典，咬文嚼字，那麼，甘迺迪的話並不難了解。

「日本漢學」應該可以從兩方面了解，廣義來講，此詞可以指涉漢學傳到日本，它本土化以後，形成獨立發展的學問。比如日本漢學、日本儒學、日本書法等等的概念，這種日本的漢學雖然可以說移植自中土，但分家以後，它們茁壯成長，甚至發展出自己的問題意識與表達形式，其面貌和中國的母體可以相去甚遠，它們與原先的母體思想之異同——就如中國大乘佛教之於印度小乘佛教一樣——特別值得玩味。

「日本漢學」的另一個定義是將「漢學」限定在中國學問的範圍內，這樣的漢學是國別歸屬的概念，是區域研究的概念，這個詞語意指日本人所研究的中國學問。近代中國學術的建立和日本關係極為密切，舉凡學術語詞的引介、傳統知識與現代學問的接榫，以及知識體系之定位等等，這些大建構無一不和日本學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日、中一衣帶水，本世紀初的中國學術巨人近水樓臺先得月，很少人沒有日本經驗，劉師培、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羅振玉、王國維，無一不然，這是個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

日人研究中國學問起步既早，涉入亦深，他們的漢學研究在世界漢學研究領域內取得領先的地位，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加上它們的文化原本即帶有大量漢文化的因子，因此，日人的漢學研究成績特別值得我們重視。

三

本書收錄的論文都已在西元二〇〇一年三月十六日、十七日臺大中文系、清大中文系及漢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論文宣讀完後，原作者根據講

評及與會學者的討論修改，再經編輯委員審核，最後才定稿。

這次會議在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我們選擇在臺大開會，具有特殊的用意。二次大戰結束前，臺大為日本帝國大學之一，它擁有臺灣其他學校無法比擬的日本漢學資源與歷史記憶。臺灣的政治歷史頗多斷層，但學術不容有斷層，尤其「漢學」這個和臺、日兩地人民生活緊密相聯的共同文化資產，更不宜在各種政治勢力的角力場中，扭曲掉它原有的面貌。我們希望就文化論文化，讓東亞地區共通的底層文化可以有公平發聲的機會。

鑒於漢學不只是門國際性的學問，連「日本漢學」也由附庸蔚為大國，它具備了國際性的學問之特質，可惜，國內學界對此議題涉入不深，國外學界專門為討論「日本漢學」而召開的會議也極少聽到，所以我們覺得在國內首度召開「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意義極為深遠。它不僅具有傳播新學術領域的知識之功能，還有喚醒國內學界正視和我們關係最密切的鄰邦的研究成績的作用。在邀請與會學者參與時，我們希望能將眼光放大，所以我們除了邀請國內的學者與會外，也邀請了大陸、韓國、德國及日本的學者共襄盛舉。我們邀請的對象，學術是決定性的考量，但我們也考慮到會議主題及各校學風的差異，所以邀請對象多元化，我們希望能儘量達到平衡各種論點的要求。

本次會議由於具運動性意義，所以我們的範圍定得較為廣泛，廣義的與狹義的日本漢學研究皆包括在內，以利各界共同參與討論。我們將論文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鄭清茂教授的引論，鄭教授宏觀的勾勒出「日本漢學」此觀念的內涵，其論點具指標意義。

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的論文分別探討儒學思想與中國文

學的問題，這兩部分的論文篇幅最多，也是此次會議的主軸。李慶及林慶彰兩位教授的論文按傳統的歸類，屬於經學，經學自然是儒學的一部分；陳瑋芬與楊儒賓的論文隱約之間有比較中、日儒家思想史的意味；中嶋隆藏教授的論文嚴格說來不侷限在儒學上面，但儒家特重歷史意識，方便說來，我們似可將中嶋教授的論文歸入「儒學思想的受納」此一部門。「中國文學的回響」此部門收有五篇論文，金文京、齋藤茂及小峯和明三位教授的論文偏向於文獻的引介與詮釋。中、日兩國交流時間特長，中國文獻流落日本者不知凡幾，類似的文獻考古學工作還大有發展的空間。陳明姿及川合康三兩教授做的工作比較像「影響的研究」，國內能觸及平安文學的學者極少，遑論研究？陳教授的論文大有開疆拓土之功。川合教授的論文進路比較特別，此文似有「心態史」的意味，他由「墮淚碑」引發聯想，並論及後人對此一主題的看法，敘述的工作做得很細膩，所以我們也將它收入「中國文學的回響」此一版塊。

中、日兩國隔洋相望，但海洋從來不是阻礙溝通的深淵，而是促進文化交流與商業往來的通衢大道。有關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引發的諸多子題，這是個重大的文化現象，值得再三討論。我們的會議雖然將焦點置於「日本漢學」上面，但很難不觸及「中、日交流」這個影響深遠的議題。新世紀伊始，東亞關係揭開新貌，我們在會議場次上設定此一主題，這應當是有意義的。

一場成功的會議與一本成功的論文集是由眾多的力量助緣而成的。我們要感謝下列單位的贊助：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教育部、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日本幡谷教育振興財團提供經費上的補助；協辦單位臺大日文系在與會學者的接待及論文翻譯方面的協助；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熱心幫忙會場的布置；臺大中文系、清大中文系及漢學研究中心的工作小組在

會議過程及會議前後的辛勞付出；黃俊傑及王勇教授幫忙出版事宜，本論文集才得以在這麼短的時期內，先後推出中、日文版。上述這些單位及學者的支持，我們感佩在心。我們更感謝與會學者的撰寫論文及熱心參與，因為只有憑藉他們的努力，我們才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看到這本論文集如期誕生。

日本漢學研究初探

目 次

前言.....	楊儒賓、張寶三	i
---------	---------	---

壹、引論

他山之石：日本漢學對華人的意義.....	鄭清茂	1
----------------------	-----	---

貳、儒學思想的受納

一、日本近代的《詩經》研究：以〈十月之交〉爲中心	李 慶	17
二、竹添光鴻《左傳會箋》的解經方法.....	林慶彰	47
三、「天命」與「國體」：近代日本孔教論者的天命說	陳瑋芬	71
四、葉適與荻生徂徠.....	楊儒賓	109
五、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思想所蘊含的問題意識：以一 九六〇年代初期的時間論爭爲中心	中嶋隆藏著、陳瑋芬譯	139

參、中國文學的回響

- 六、日本平安初期物語對中國文學之受容.....陳明姿 155
- 七、日本龍谷大學所藏元朝郭居敬撰《百香詩選》等
四種百詠詩簡考.....金文京 177
- 八、《敦煌願文集》與日本中世紀唱導資料
.....小峯和明著、陳靜慧譯 187
- 九、峴山之淚：羊祐「墮淚碑」的繼承
.....川合康三著、朱秋而譯 197
- 十、關於殘存在日本的唐詩資料.....齋藤茂 213

肆、東亞文化交流史

- 十一、淡海三船與東亞的詩文書籍交流.....王 勇 225
- 十二、關於日本漢文學歷史展開之一考察：與韓國漢文
學作比較.....沈慶昊著、金培懿譯 253
- 十三、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漢學家眼中的文化中國與現實
中國.....黃俊傑 279
- 十四、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
.....張寶三 323
- 十五、明治時期漢學私塾之教育功能
.....Margaret Mehl 著、陳瑋芬譯 351

名詞索引|..... 375

人名索引|..... 383

他山之石：日本漢學對華人的意義

鄭清茂*

今天有這麼多來自國內及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聚在一起，舉行這次「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實在是個非常難得的盛事。據我所知，專為「日本漢學」舉辦國際性的研討會，不但在臺灣，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在這裡，我要向合辦這次會議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與漢學研究中心，表示由衷的感謝。更要對各位籌備委員的高瞻遠矚，辛苦勞累，致以無上的敬意。日本已故漢學大師吉川幸次郎先生，曾經在一首詩裡說：「願逢四海爲家日，趙瑟秦聲共一堂。」¹雖然吉川先生四海爲一家的願望尙未能完全實現，但至少今天從不同國家來了這麼多貴客，共聚一堂，研討吉川先生奉獻其一生的學術領域，如果他老人家天上有知，可能也會頷首微笑，表示肯定吧。

眾所皆知，一般所謂漢學是研究中國文化或文明的學問，屬於區域性研究（area studies），大約相當於英文的 sinology 或較現代的 Chinese studies。大凡中國的語言、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經學、歷史、政治、社會，甚至文物考古、風俗習慣等，只要與中國有關的題材，都是漢學的研究對象。在日本，則自明治時代開始，或稱之爲支那學；而在近半世紀以來，又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¹ 《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8-1970年），第20卷，頁520。詩題〈大阪藝術祭中國歌舞團絕句四首〉之四（1958），原收錄《知非集》甲。以下引《吉川幸次郎全集》均簡稱《全集》。

稱之爲中國學。²

日本的漢學，由於特殊的地緣與歷史背景，較之西方諸國，不但更爲悠久，至少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而且範圍更加廣泛，門類更加繁多，很難一言以蔽之。譬如說，這次學術研討會所包括的三個子題：第一是日本中國學研究；第二是日本傳統漢學漢文學研究；第三是中日文化關係或學術交流研究。其中，第一項是屬於世界性的普遍範疇，純粹以中國文化爲研究的對象，可以歸爲國際漢學的日本學派。第三項的文化或學術的交流，屬於廣義的比較研究，也是各國漢學家可以討論的共同課題。只有第二項的傳統漢學漢文學，卻是日本所特有的。（或可加上韓國與越南，但不在本次會議範圍之內。）

下面我想就上面所學的三個子題，根據個人極爲有限而淺陋的有關資訊，從一個華人的觀點，回顧一下日本漢學的沿革與業績，及其對華人漢學界的意義。然後，還想附帶地談談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學術風範，藉以反躬自省，表示個人對這位漢學大師的無限感念之情。老實說，今天我在這裡作這個主題演講，總覺得有點僭越而感到相當惶恐；因爲嚴格地說我自己並不是日本漢學的專家，至多只能說是個在長年累月的教學研究生涯中，有緣接觸到日本漢學家的一些著作，受到啓發或衝擊，而獲得了不少益處的人。還有一點要聲明的，由於我本人的主要興趣在文學方面，對於其他分野所知有限，所以今天所談的，儘管無意以偏概全，但是恐怕也難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² 關於漢學及相關名稱，如漢文學、儒學、儒教、東洋史、東方學、支那學、支那文學等等，請參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特別是頁1-2、42-43；戶川芳郎：〈漢學シナ學的沿革とその問題點——近代アカデミズムの成立と中國研究の系譜（二）〉，《理想》397號（1966年），頁8-25；陳瑋芬：《近代日本と儒教——「斯文會」と「孔子教」を軸として——》（福岡：九州大學博士論文，1999年），第2章等等。

的缺憾。希望在座的各位專家學者，匡我不逮，不吝指教。

先談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明治年間（1868-1912）是傳統的日本漢學轉形為近代的日本支那學或中國學的過渡時期。明治維新之後，根據「五箇條御誓文」（1868）中「廣求知識於世界，以振皇基」的精神，日本開始轉向西方尋求所謂「文明開化」的靈感與「富國強兵」的良策，在「舉國一致」的體制下，積極地在各方面展開了現代化運動。包括漢學在內的學術教育界也不例外。當時有一批具有傳統漢學素養的年輕書生，也在西方思想的衝擊下，不甘故步自封，發出振衰起敝、力圖自強的呼聲。例如明治二十八年（1895，光緒二十一年）在《帝國文學》第一卷第二號上，一篇不署名而題為〈現今の漢學〉的短文裡，就有慷慨激昂的發言，擇引如下：

衰哉世之所謂漢學家，吁！彼等今何所為？又欲何所為哉？若終以訓詁釋義或比擬考索為漢學之能事，是不知十九世紀之學問者也。……支那民族之思想乃吾人極需關注者，如從文明史上或語言學上比較闡究之，豈非一大快事？每想今日〔西洋〕所謂支那學者（sinologue）之徒，隔洋之東西，如何盡瘁於此，則我邦漢學家宜蹴枕而起；蓋我臥榻已容他人鼾睡其中矣，非耶？無須多言，支那學是也。此二千年來支配我國民之思想者，非已成日本學而何？西洋學者難於解讀漢文，故欲使其博學多識，蓋不可能。是以憑一己之習氣，漫作概括性之臆斷，而陷於謬誤者甚多。今日及未來，能充當此任者，除我日本人，世界中又有何處可以求之？……今日在少壯有為之漢學家哲學家之間，支那學之科學化研究運動，大有興起之勢，可謂我學術界之一大慶事。³

³ 引自戶川芳郎：〈漢學シナ學の沿革とその問題點——近代アカデミズム

從這篇宣言式的文章裡，不但可以看出明治中期日本年輕支那學者的抱負、願景與使命感，而且也看到他們急於擺脫傳統漢學的侷限，企圖把漢學變成科學化現代化學術領域的努力。據說，後來成為京都支那學派創始人的狩野直喜（1868-1947），就是當時《帝國文學》雜誌的編輯委員之一。⁴

有趣的是明治年間開始嶄露頭角的支那學者，大多有留學或遊歷歐洲的經驗，也多有訪問考察清國的機會。他們受到西方漢學的啓迪與激勵，也看到西方漢學的長處與缺失，而產生了分庭抗禮，一比高下的雄心壯志。結果是相當豐碩的。就中國文學研究為例，最明顯的成績是文學史的著述。一般人認為世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是英國人 Herbert A. Giles 在 1901 年出版的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但事實上，早在 1882 年（明治十五年，光緒八年），日本學者末松謙澄就出版了《支那古文學略史》。雖然這本書的重點在儒家與諸子的概說與批判，嚴格地說，不能算是近代意義上的「文學史」之作，但能提出「文學史」這個概念，開創了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仍是功不可沒的。

其後十五年，古城貞吉（1866-1949）出版了《支那文學史》（1897），是一本稱得上近代意義的文學史專門著作。從此以後，類似的論著接連而來。舉其要者，如笹川臨風的《支那小說戲曲小史》（1897）與《支那文學史》（1898）、藤田豐八等五人合撰的《支那文學大綱》十六卷（1897-1904）、兒島獻吉郎的《支那文學史（古代篇）》（1905）與《支那文學史綱》（1912）、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1919）等，不下十種。這些文學史的特色之一是除了傳統的詩文之外，也都重視

の成立と中國研究の系譜（二）》，頁 19。本文所引中譯，均出自筆者。

⁴ 同前註戶川芳郎一文，頁 18-19。

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的論述。⁵明治時代在日本中國學史上，的確是個極為重要的轉捩點，而且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說：

明治以後的日本文明，展示了一些新的成果。其大者之一是在東方的，特別是中國的文明歷史的研究上，從江戶時代漢學的偏狹、獨斷與散漫中，擺脫出來，樹立了新的體系以及正確的認識。這些業績的取得每每先於中國本土或西洋。⁶

這段話並無言過其實之處。事實上，這些明治時代的有關中國文學的著作，經過翻譯、改編或介紹，對民國初期的中國文學研究與教學，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進入大正（1912-1926）以後，日本中國學者在中國文學方面的研究，不但在理論與方法上繼續推陳出新，而且在範圍上也愈加廣泛。從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包括各種文類、個別作家、專書或作品，都變成了探討的對象。在方式上則有評釋、譯註、概論、批評、斷代史或通史、全集或大系的編纂等。在學風上則「京大繼承了清朝的考證學，重視資料的斟酌、新資料的發現、作品的精密解讀；又在元曲研究上參考了法國人的論著之類，強調科學主義的立場。爾來，東大是在漢學的傳統上加以西洋文學的方法論；京大則是清朝的考證學加歐洲的東洋學。東西各自保其學風，作為我國中國文學研究的核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⁷除了核心的東大、京大之外，在其他公私立大學如東北大學、九州大學、早稻田大學等，也開始設立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等中國學的課程，培養人材，進行研究，成績斐然。譬如兒島獻吉郎的《支那文學考》（1920）、狩野直

⁵ 關於明治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詳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頁 341-371；吉川幸次郎：〈中國文學研究史〉，《全集》，第 17 卷，頁 388-396。

⁶ 〈「東洋學の創始者たち」序〉，《全集》，第 25 卷，頁 250。

⁷ 吉川幸次郎：〈中國文學研究史〉，《全集》，第 17 卷，頁 396。